

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求真学术文库

民国时期
《礼记》
研究考论

郎文行
著


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(CHINA)

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求真学术文库

民国时期《礼记》研究考论

郎文行 著


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(CHINA)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民国时期《礼记》研究考论 / 郎文行著. -- 北京 :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 2019. 6

ISBN 978 - 7 - 5201 - 5020 - 0

I. ①民… II. ①郎… III. ①礼仪 - 中国 - 古代②《
礼记》 - 研究 IV. ①K892. 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9)第 115732 号

民国时期《礼记》研究考论

著 者 / 郎文行

出 版 人 / 谢寿光

责任编辑 / 杜文婕

文稿编辑 / 李 伟

出 版 /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(010) 59367143

地址: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: 100029

网址: www.ssap.com.cn

发 行 / 市场营销中心(010) 59367081 59367083

印 装 / 三河市龙林印务有限公司

规 格 / 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: 18.75 字 数: 248 千字

版 次 / 2019 年 6 月第 1 版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 - 7 - 5201 - 5020 - 0

定 价 / 88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(010-59367028)联系

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

001 / 绪 论

017 / 第一章 民国时期《礼记》考证研究（上）

019 / 第一节 《礼记》渊源研究考论

047 / 第二节 《王制》作者研究考论

083 / 第二章 民国时期《礼记》考证研究（下）

085 / 第一节 《月令》来源研究考论

111 / 第二节 《今月令》出处研究考论

131 / 第三节 《学记》作者研究考论

147 / 第三章 民国时期《礼记》经解研究

149 / 第一节 简朝亮《礼记子思子言郑注补正》研究

172 / 第二节 魏元旷《礼训纂》研究

206 / 第三节 刘咸炘《礼记温知录》研究

235 / 第四章 民国时期《礼记》通论研究

237 / 第一节 刘咸炘《礼记》学探微



249 / 第二节 蔡介民《礼记》学研究

272 / 结 论

278 / 参考文献

294 / 后 记

绪 论

一 民国时期《礼记》研究文献概述

本文研究所称的民国时期《礼记》研究文献，是指民国时期的学者关于《礼记》研究的各种著述，对于由清代步入民国或由民国步入新中国时期的学者，本文研究以他们在民国时期（1912—1949）的著述为主要的考察对象，适当关注他们在此前或此后时期的学术著作。民国时期《礼记》研究文献的著录，以王锸老师《三礼研究论著提要》中民国部分最为完备，民国时期《礼记》研究文献的查考，当前有台湾学者林庆彰先生主编之《民国时期经学丛书》与大陆学者耿素丽、胡月平先生选编之《民国期刊资料分类汇编·三礼研究》最为方便。《民国时期经学丛书》中《礼记》部分收录了民国时期《礼记》研究的各种出版著作，《民国期刊资料分类汇编·三礼研究》编选有民国时期各种报刊发表的《礼记》研究专题论文。另外《晚清和民国报刊》等电子数据库，也可以查阅民国时期各类报刊所发表的《礼记》研究类论文。经过阅读，我们看到民国时期的《礼记》研究文献，著述体裁多种多样，研究方法不拘一格，研究思想有着较为鲜明的时代特征。

根据著述的类别、著述的时间，我们先将《民国时期经学丛书》

中《礼记》类文献梳理如下。

第一，通论类著作。刘咸炘《治记绪论》，本着六经皆史的基本观点，提出摒弃《礼记》中曲文仪节类篇目，专取通论类如《礼运》《礼器》等内容，进而对《礼记》分理篇章、疏通经解的研治方法。蔡介民《礼记通论》考证了《礼记》成书与各篇目产生的时代，对《礼记》各篇目的大义进行概括，也提出了分门别类研治《礼记》的观点。唐文治《礼记大义》，汉宋兼采，强调礼学“救民命、正人心”的社会作用，梳理《礼记》各篇的大旨，论说其中的现实价值。

第二，通释类著作。如刘咸炘《读大小戴记小笺》对大小戴《礼记》中部分篇目的章句义理进行阐发。廖平《礼记识》则以今文经学观点吸收进化论思想，对《礼记》进行文字疏解与校订等。又南京图书馆藏有戴礼《礼记通释》^①，为行文方便，亦略叙于此。此书是民国时期独有的一部《礼记》通释性著作，汇集郑注孔疏以下各家之说，包括《卫氏集说》所引诸家之解，朱熹《仪礼经传通解》，吴澄《礼记纂言》，陈澧《礼记集说》，李光坡《礼记述注》，方苞《礼记析疑》，《钦定礼记义疏》，姜兆锡《礼记章义》，孙希旦《礼记集解》，王念孙《读书杂志》，王引之《经义述闻》，郭嵩焘《礼记质疑》，等等。

第三，条辨类著作。此类著作或阐发义理、或训诂文字、或考释名物、或解说礼制。如刘咸炘《礼记温知录》，疏通章句、阐释义理。魏元旷《礼训纂》训诂字词、解说礼制。简朝亮《礼记子思言郑注补正》以为《坊记》《表記》《缙衣》均为子思所作，而郑注间有不妥，为之补正三卷，又附《礼记》其他篇目以及《仪礼》《周礼》《大戴礼记》读书札记若干条。

第四，选本选注类著作。随着科举考试的废除、辛亥革命的爆发、五四运动的兴起、西方思想的大量涌入，经学在中国大地失去了政治

^① 戴礼（1880—1934），女，浙江玉环人，著有《大戴礼记集注》《女小学》《礼记通释》等，其《礼记通释》刊于1933年，计八十卷，总百万言。

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。《礼记》作为经典之一，在这样特定的时代环境之下，普通人学习研究《礼记》，尤其是其中关于上古礼制的内容，应该抱有怎样的态度，这是民国学者必须面对的问题。与此同时，经典自身也在经历身份的转型，许多学者转而探求《礼记》中切关人格修养方面的伦理思想，并以此为基础而扩大《礼记》学习、研究的范围，这样一批选本选注就应运而生了。如杨钟钰重辑《礼记摘要》，吴曾祺《礼记菁华录》，叶绍钧选注《礼记》，马通伯集注《礼记节本》，钱基博《礼记约纂》，王梦鸥《大小戴记选注》。其中王梦鸥《大小戴记选注》，以儒者论学“修己以安人”、《大学》纲目“修齐治平”为旨趣，将所选大小戴《礼记》分为上、下两编，始于《大学》，终于《乐记》，上编为通论，下编为通礼，所谓“兴于诗、立于礼、成于乐”，所取篇目、所定篇次，内部有着相对完整而又严密的逻辑，代表了民国时期《礼记》选本的最高成就。

第五，《礼记》单篇研究类著作。此类著作数量最多，思想内容也较为复杂。如廖平《礼运三篇合解》《坊记新解》的今文经学解经思想，与《礼记识》基本相同，《礼运三篇合解》文中，廖平以《礼运》本文为纲，将《礼器》《郊特牲》分置于《礼运》之下，形成一个以今文经学为本，并吸收进化论思想、容纳近代新事物的说礼体系，冯友兰《中国哲学史》谓之为“旧瓶装新酒”^①。方思仁《礼运大同篇注释》，指出“大同”与“大道”相同，其含义都是“太平”，乃是孔子的根本政治抱负；他以为大同与小康在本质上并无区别，前者是不受时代限制的政治理想，后者是受时代限制的政治实效；他在文中进一步指出礼与大同社会的关系，认为礼是实现大同社会天下太平的不二途径。吕思勉《大同释义》，结合历史学的观点，论证大同社会曾于三皇五帝之时真实存在，并梳理了大同变而为小康而为乱世的

① 冯友兰：《中国哲学史》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1，第331页。

内在逻辑。王树枏《学记笺证》博引古书，对《学记》语词、名物进行训诂、解说，是所谓“笺”；训诂以外，王氏比较当时西方的教育思想与《学记》的异同，提出《学记》教育思想仍能切于世用，著作之中对晚清民国的学制作了较为具体的规划，是所谓“证”。姚明辉《学记集义训俗》，旨在通过汇集《学记》旧注，探讨《学记》大义，以对当时的西化弊病进行批评，从而达到“训俗”的目的。杜明通《学记考释》，将《学记》语词、文法、思想内容与《春秋繁露》进行比较，考定《学记》的作者为西汉董仲舒，是所谓“考”；考证之后，也对《学记》经文进行疏通，其中不乏可以征信的见解，是所谓“释”；除此以外，本书对《学记》的教育方法、教育目的也做了专门的论述。向宗鲁《月令章句疏证叙录》，考证《月令》的来源，赞同汉代蔡邕之说，以为《月令》不取于《吕氏春秋》，《礼记》《吕氏春秋》俱取《月令》于《逸周书》，此书序录虽就，而疏证未能完成。徐仁甫《儒行集释》，亦汇集众说，疏通经文。

以上是《民国时期经学丛书》所收录的有关《礼记》研究的著作概况。民国时期各种报刊发表的《礼记》研究论文，涉及《礼记》研究的多个方面，计有120余种，多为对《礼记》单篇研究，我们按《礼记》篇次略叙如下。

第一，《曲礼》类。日本学者义内武熊著，马道远译《曲礼考》；黄巩《〈礼记〉“为人臣之礼不显谏”与〈檀弓〉“事君有犯无隐”讲义》；章太炎《驳金氏五官考》三种。

第二，《檀弓》类。《春轩随笔——檀弓失实》、时鳌《檀弓非六国时人辨》、姚石子《檀弓志疑》等，皆辨《檀弓》记事不实。

第三，《王制》类。廖平《王制集说》、刘师培《王制篇集证》、黄谔《王制附庸考》、金德建《王制丛考》、邝平樟《〈礼记·王制〉及〈周礼·职方〉所言封国说比较》、郭汉三《〈王制〉〈职方〉封国说之不同及后儒之弥缝》。这几篇文章的内容，多探讨《王制》的来

源问题，刘师培、金德建的观点是《王制》为汉文博士所作。

第四，《月令》类。《月令论》类论文大致可以分为两种。一为《月令》来源的研究，如刘师培《月令论》，杨宽《月令考》《今月令考》，王公贤《〈礼记·月令〉篇是否即〈明堂月令〉而郑注引〈今月令〉又为何书考》，容肇祖《月令来源考》，童书业《读容肇祖先生〈月令〉的来源考质疑》，蒙季甫《月令之渊源与其意义》，等等。一为《月令》的校勘训诂研究，如沈延国《〈吕氏春秋·十二纪〉〈礼记·月令〉〈淮南·时则训〉〈逸周书·时训解〉异文笺》、刘先枚《释月令马政之禁》、周候于《月令篇五化释误》等。

第五，《礼运》类。《礼运》类论文大致可以分为四种。一为《礼运》思想着重于“大同思想”的发挥与阐释，如康有为《礼运注》、廖平《大同学说》、沈艾孙《大同学说》、方竑《礼运说》、夏敬观《读礼运》、何崧培《从三民主义的观点上分析〈礼运·大同〉》、卢宗培《礼运大同篇政治哲学的研究》等。二为《礼运》篇章的释义与解说，当然这种释义解说的目的，也是对《礼运》以及“大同思想”的发挥，如郑沅《礼运大道之行一节释义》、钱基博《读礼运卷头解答题记》、高鸿缙《礼运大同篇五读》等。三为《礼运》思想着重于“大同思想”的来源考辨，如吴虞《儒家大同之义本于老子说》、金德建《思想史上之汉代礼运篇本质与汉代社会的研究》、王新民《礼运大同篇溯源》、任启珊《〈礼运·大同〉章辨源》、张学昭《〈礼运〉与孔子学说的分析》、周予同《大学和礼运》等。四为《礼运》篇章文字有无错简的考辨，如陶邵学《礼运错简考》、李翊灼《礼运大同小康章文并无错简议》、郭袞孟《〈礼运·大同〉章句错简辨正》等。《礼运》大同小康篇，自康有为将其与《春秋》公羊学之“三世说”相沟通，孙中山先生将其与三民主义结合以后，在民国时期影响颇大，对其阐释发挥的论文，管见所及就有四十余篇。上述四个方面的文献，内容互有交叉，整体上可以反映民国大同思想研究的动向：一为对康

有为思想的申论与辨正；一为对孙中山思想的发挥，并以此衍生出其他政治哲学思想。

第六，《明堂》类。有陈焯《议院古明堂说》、杨宗震《明堂通考》、顾颉刚《阮元明堂论》、王治心《明堂制度与宗教》等。

第七，《学记》类。《学记》类论文也可以分为两个方面。一为《学记》经文疏通，如陈柱《学记通论》、董文煜《礼记学记篇今释》等。一为《学记》与现代教育思想的相互比较，如马彭年《学记篇里的教育思想》、章廷俊《学记的教育制度与教学法则之剖析》、陈启天《学记通义》、郑其龙《学记中的教学原理与方法》。当然，这两个方面的内容也是相互联系的。

第八，《儒行》类。《儒行》类论文的内容主要是经文疏通，中间也有思想发挥，如陈景奩《儒行衍义》、厉时中《儒行释义》、梦蝶《儒行通释》、陈柱《儒行集解》、章太炎《儒行大意》等。在民国风云突变新旧交替的时局中，《儒行》的思想为知识阶层的立身处世提供了极大的精神支持，这使《儒行》在民国期间得到了较多的关注。

民国时期的报刊论文，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，《礼记》其他篇目以及通论性的研究论文也比较多，限于篇幅，这里就不再过多叙述，具体的论文目录，详见文后的参考文献。

民国时期关于《礼记》单篇研究的著作中，关于《大学》《中庸》的数量也比较多，《大学》《中庸》自宋代进入《四书》系统，在理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，这是此类著作数量较多的原因。本文有关民国《礼记》文献的研究，属于礼学研究的范畴，旨在梳理民国时期《礼记》研究的学术史，解决《礼记》研究的基本问题，这与理学研究范畴的《学》《庸》文献研究，在研究的对象、方法与目的上，都有着根本的不同。因此，本文对理学范畴的《学》《庸》著作，一般不作讨论。

二 本文选题的理由与意义

(一) 学术史研究价值

《礼记》是儒家经典“十三经”之一，为七十子后学传经所记，其性质是配合《仪礼》的辅助性资料，汉末郑玄注《周礼》《仪礼》《礼记》，撰《三礼目录》，后世遂有三礼郑氏学。《周礼》的内容是职官系统，著述之时可能有现实依据，但却未必见诸实行。《仪礼》记载先秦时代大夫士阶层冠、婚、丧、祭、朝、聘、射、乡的各种礼节，这些礼节随着社会的发展，汉代已经不能完全采用。《礼记》的内容，或通论礼的产生与使用，如《礼运》《礼器》；或议论礼与政治的关系，如《哀公问》《孔子闲居》；或发明礼的教化作用，如《表記》《缙衣》；或说明礼的制作缘由，如《祭义》《昏义》《丧服四制》等。凡此种种，旨在说明礼的原理，因此《礼记》有着《大传》所谓之“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”^①的意义，进而成为后世制礼损益变革的重要理论依据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《礼记》地位也得到不断的拔高，唐修《五经正义》，《礼记》已超越《仪礼》，成为官方指定的礼经。而历代学者对《礼记》的注释疏解也层出不穷，这都说明《礼记》在传统中国文化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。

中国传统社会发展到清代，仍在以礼教为中心的经学思想主导之下逐步向前推进。然而彼时的西欧诸国却经历了文艺复兴、启蒙运动、工业革命，政治制度大多走上了民主发展道路，科学技术更是取得了日新月异的进步，中西之间的差异或者差距，变得越来越明显。两次鸦片战争，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古老中国封闭的国门；中法战争、甲午战争、八国联军入侵等的一系列对外战争的失败，以及战后的割地赔款、开口通商，更让天朝上国的君臣上下颜面尽失；中西力量如

^① 郑玄注，孔颖达疏《礼记正义》卷三十四，《十三经注疏》，中华书局，1980，第1506页。

此悬殊，给中国社会的知识阶层带来了巨大的心理震动。白银外流，战争失败，政治落后，国家的积贫积弱，直接引发了当时知识阶层对本国思想文化、政治制度的反思。“睁眼看世界”时的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，“洋务运动”时的“中体西用”，“戊戌变法”时的“维新改制”，以及此后的“预备立宪”“辛亥革命”，都是这种文化政治反思的结果，这一历史阶段，李鸿章称之“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”^①。“预备立宪”废除了实行一千多年的科举考试选拔制度，“辛亥革命”更是一举推翻了沿袭数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，传统经学从此走下政治神坛，失去了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。

《礼记》作为经典之一，既然在传统社会中占有如此重要地位，又面临如此巨大的社会变局，在新的时代环境之下，遭受了怎样的待遇？知识阶层是否仍旧对它进行研究？如果仍旧对它进行研究，这种研究又曾发生过怎样的变化、呈现出怎样的面貌？这是经学研究或者史学研究都不能回避的问题。根据以上的文献综述，我们可以看到，《礼记》作为经典虽然失去了思想统治地位，但它仍旧能够对当时的社会思想与生活产生影响，其中关于人格修养、道德完善以及治国理政的观念，大部分仍旧能够为人们所认同，毕竟经典的内涵不会因为一时的政治变化而立刻消解，民国时期的《礼记》研究仍在继续。因此我们以为，对民国时期的《礼记》文献进行梳理、研究，进而勾勒民国时期《礼记》研究的学术面貌，是研究中国礼学史的必要，也是研究整个民国学术史的一个部分。这种研究，不仅能为中国礼学史、民国学术史的研究提供较为可靠的资料，而且还能给当代的《礼记》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。

（二）《礼记》研究的价值

《礼记》成书于汉代，但其成书的具体过程以及具体篇目的来源，

^① 李鸿章：《筹议海防折》，《李鸿章全集·奏稿》，时代文艺出版社，1998，第1063页。

历来就争讼难息不能一定。郑玄以后，历代学者对《礼记》的疏注，虽然种类繁多数量巨大，但由于语言文字名物制度等的古今差异，《礼记》的文本解读至今仍然存在较多疑难。随着时代的变化，不同学者在其特定的历史环境之下，因其不同的学术立场与研究方法，对《礼记》作出的不同阐释，难免也会带来新的问题。这些都构成《礼记》研究的基本内容，虽经历代学者的反复探讨，但这些基本问题，仍旧很难说已经得到了彻底的解决。因此，研究民国时期有关《礼记》研究的文献，本身也是对《礼记》的研究。

民国礼学踵继清代朴学与晚清今文经学，有着良好的学术积累，在巨大的时代变局之中，又能广泛地接触新的知识、思想与方法。就我们阅读的文献来看，民国学者对《礼记》研究的各个方面均有涉及，对具体的问题，往往还能够提出新的意见，这为《礼记》基本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更多的思路，对《礼记》研究有着较高的参考价值。比如《礼记》语词训诂、礼制解说、经义阐发等，民国学者每于郑、孔之间，提出新的观点。

《乐记》之“声”“音”“乐”“清浊”“小大”“曲直”“繁瘠”“廉肉”等音乐术语的具体含义，旧注往往语焉不详。张清常《乐记之篇章问题及所用音乐术语》^①一文，根据古书材料，从现代音乐学的角度，对上述的几个术语的含义作了详细的探讨，如其释“清浊”：

《乐象》篇云：“倡和清浊，迭相为经”，郑注：“清谓蕤宾至应钟也，浊谓黄钟至中吕。”案郑注不惟呆板，且未必与本文所谓“倡和”之情形相应。《吕氏春秋·适音》篇：“太清则志危。”“太浊则志下。”高诱未注。《左传·昭公二十一年》：“清浊、大小、长短、疾徐、哀乐、刚柔、迟速、高下、出入、周疏，

^① 张清常：《乐记之篇章问题及所用音乐术语》，《中山文化季刊》第1卷第3期，1943，第396~403页。

以相济也。”杜注除“周密也”外，余均无说。考《太平御览》五七七引蔡邕《月令章句》云：“凡弦急则清，慢则浊。”又五八〇引《乐纂》云：“歌声浊者用长笛长律，歌声清者用短笛短律。”又五八一引《通礼义纂》云：“蔡邕曰：管长则浊，短则清。”可知笛短管，旋律急，则震动数多，斯乃高音，是为“清”。笛管长，旋律缓，则震动数少，斯乃低音，是为“浊”。

今案张氏所说，可为定论。

《曲礼》云：“男女不杂坐，不同椽枷，不同巾栉，不亲授，嫂叔不通问，诸母不漱裳，外言不入于梱，内言不出于梱。女子许嫁纓，非有大故不入其门。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，兄弟弗与同席而坐，弗与同器而食，父子不同席。”郑注：“父子不同席”谓“异尊卑也”。孔疏：“兄弟弗与同席而坐者，虽已嫁及成人，犹宜别席。不云侄及父，唯云兄弟者，侄、父尊卑礼殊，不嫌也。”^①“父子不同席”，郑注未明此“子”字指男子、女子，或兼指男女。如孔疏“侄、父尊卑礼殊，不嫌也”之义，则父与女子子，因为尊卑礼殊可以同席，而本经“父子不同席”则专据男子而言。然本节经文，自上而下均说男女之别，孔疏说“父子不同席”为父与男子不同席，似与经文不类。简朝亮《礼记子思子言郑注补正》，于此申明郑注谓：

谨案《表記》曰“父子不同位，以厚敬也”。夫席之位有上下不同，则异尊卑也，此自男子言之。其不同位者，岂必不同席乎？今日“父子不同席”，此承上文已嫁而反者之言女子子也。盖女子自父言之，则为女子子，斯父子也，故曰“父子不同席”。^②

① 郑玄注，孔颖达疏《礼记正义》卷二，《十三经注疏》，中华书局，1980，第1241页。

② 简朝亮：《礼记子思子言郑注补正》，《民国时期经学丛书》第六辑第34册，台湾文阁图书有限公司，2013，第288页。

今案简氏说此条礼制，以为“父子不同席”指父与女子不同席，兼顾上下文义，实长于孔疏。

《礼器》云：“礼，时为大，顺次之，体次之，宜次之，称次之。”郑注“言圣人制礼所先后也”。孔疏：

礼时为大者，揖让干戈之时，于礼中最大，故云时为大也。顺次之者，虽合天时，又须顺序，故顺次之也。体次之者，有时有顺，又须小大各有体别也。宜次之者，大小虽有体，行之又须各当其宜也。称次之者，称犹足也，行礼又须各自足也。^①

刘咸炘谓：“此五义乃制器仪之原理，原文虽有解说，而言太浑，旧说遂泛以礼之原理解之，不见分别，如体为体统、顺为次序，及宜之与称，皆成同义异名不见分别。”其《礼记温知录》详解此文：

盖所谓时者，合天时也，如因天地变易而定期与三年之丧，因春露秋霜而制禘尝之礼是也；顺者，顺人情也，如始死哭踊无节、余阁之葬是也；体者，体物德也，如郊器用陶匏、明水象主人之洁是也，《荀子》所谓“贵本之谓文”亦在此中；宜者，依事宜也，如杖以扶病、铭旌以识死者是也，《荀子》所谓“亲用之谓理也”。天时统一切事物，故为首；人情为礼之本，故次之；物德事宜又次之；皆自然也。若称者，则非依自然，不过为之等差以别贵贱耳。……祭天牺牲，体也，此固无关天时、非依人情、非为事便、亦非以示别，乃因天德大而精，观天下之物，无可以称其德者，故以此独特混全者象之。天子七月而葬，诸侯五月，大夫三月，宜也，此固非天时应如此，亦非有所象，若论人情，则孰不愿迟葬，岂诸侯以下之于父母每下愈薄乎？然事必如是乃便，天子须待同轨之至，诸侯止待同盟之至，而大夫更无须也……

^① 郑玄注，孔颖达疏《礼记正义》卷二十三，《十三经注疏》，中华书局，1980，第1431页。



五义中顺宜二义，最易见而尤不待言，最难解者惟体，故礼中所解如《郊特牲》等篇宜最少而体为最多，《荀子》所谓“贵本尚质特有取义”者大多此类。又礼中器数之繁属于顺、宜、体不多，而最多者惟称，礼家既习于此，故特详于等差，自荀卿以降，皆注意于此，偏辨尊卑遂流于法家矣。^①

刘氏于此详辨“时、顺、体、宜、称”之分别，说明礼仪、器物制作的缘由，条分缕析事类分别，较之孔疏尤为明切。

民国学者对《礼记》的研究，并不局限于训诂、礼制、经义等方面，对《礼记》的成书与篇章来源的考证，使用的方法更加多元，比以往的讨论也更加深入。《礼记》成书的讨论，有蔡介民《礼记通论》、洪业《礼记引得序》、童书业《二戴礼记辑于东汉考》等。篇章的考证，涉及《王制》《月令》《礼运》《乐记》《学记》等篇目。民国学者的考证，均能在过去学者讨论基础上，运用更新的材料或更新的方法，提供更为具体的结论，其中许多观点也为现代学者继承或者发展。以下正文于此有详细的讨论，这里就不再赘述了。

三 国内外该课题的研究现状

当代对民国时期《礼记》学文献的专门研究，尚未出现一部系统的著作。但对民国礼学的关注，早在2007年，有山东师范大学盖志芳硕士学位论文《民国礼学的历史考察》，考察民国礼学的概况。该文旨在“从学术史角度考虑礼经、从政治史角度考虑礼制，从思想史角度考虑礼教——从整体上考察‘礼学’在民国时期由传统向近代之转型轨迹”^②，共分八个章节：民国礼学文献的统计、民国礼学文献考

^① 刘威忻：《礼记温知录》，《民国时期经学丛书》第六辑第32册，台湾文听阁图书有限公司，2013，第26页。

^② 引自该文摘要。